

Gulliver's Tra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ology: The Intertwining of Satire and Power Critique

ZHANG Hongjin

Ningbo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December 10, 2025

Accepted: February 20, 2026

Published: March 31,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ZHANG Hongjin. (2026). *Gulliver's Tra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ology: The Intertwining of Satire and Power Critiqu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1), 203–207, DOI: 10.53789/j.1653–0465.2026.0601.023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1.023>

Abstract: *Gulliver's Travels*, the classic work of satirical literature by Jonathan Swift, offers a pointed critique of multiple dimensions of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society through the protagonist Gulliver's four extraordinary voyages.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novel from a narratological perspective,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its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non-linear configuration of time and space,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unreliable narrator. By examining these narrative features, the study elucidates how the text, under the guise of an absurd and fantastical framework, exposes the fluidity of power and the fragility of social order. Gulliver's position as narrator—together with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his perspective—enables Swift to deliver a sophisticat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social inequities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Moreover, the deliberate dislocation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coordinates elevates the work beyond the realm of a simple adventure narrative, allowing it instead to deploy absurdity as a means of articulating deeper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and of constructing an allegorical critique of the period'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Keywords: *Gulliver's Travels*; narrative structure; time and space; unreliable narrator; allegorical critique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ZHANG Hongjin is a postgraduate student pursuing a degree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Her academic interests focus on British literature. Her Email address is 951486045@qq.com.

敘事學視角下的《格列佛遊記》： 諷刺與權力批判的交織

張鴻錦

寧波大學

摘要：《格列佛遊記》是諷刺大師喬納森·斯威夫特的諷刺文學經典，通過描繪主人公格列佛的四次奇幻冒險，展示了對英國社會不同側面的深刻批判。本文從敘事學的角度分析該作品，重點探討小說的敘事結構、時間與空間的非線性構建，以及不可靠敘述者的作用。通過對這些敘事元素的分析，揭示小說如何在荒誕的敘述框架下反映權力的流動性和社會秩序的脆弱性。通過格列佛這一敘述者的身份與其不可靠性，小說巧妙地批判了 18 世紀英國的政治腐敗和社會不公。同時，時間和空間的錯亂構建使該小說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冒險故事，更是在荒誕中揭示深刻的社會意義，對當時社會政治體製等進行隱喻批評。

關鍵詞：《格列佛遊記》；敘事結構；時間與空間；不可靠敘述者；隱喻批評

一、引言

斯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1667—1745) 不僅是 18 世紀英國傑出的政治人物，也是啟蒙時代最具影響力的諷刺文學作家之一，他於 1720 至 1725 年積極投身於愛爾蘭人民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相關活動期間，創作了《格列佛遊記》。該小說不僅僅是冒險小說或兒童文學的代表，更是一部以荒誕和諷刺為手段，深刻揭示社會和政治問題的作品。在小說中，斯威夫特借助豐富的想象力塑造了四個截然不同的虛構國家——小人國、大人國、飛島國和慧駟國。通過這些國家各具特色的情節安排，斯威夫特深刻揭示並諷刺了 18 世紀英國的社會弊端，而這四個部分並非獨立存在，而是相互關聯，共同構成統一的敘事整體。

本論文旨在從敘事學視角出發，基於熱奈特在 20 世紀 70 年代《敘述話語》中提出的『時序』『時距』和『頻率』三個核心概念，並結合布思關於『不可靠敘述者』的理論，構建小說文本的分析框架。儘管將經典敘事學理論應用於《格列佛遊記》的研究在既有學術傳統中已較為成熟，但在當代語境下，重新審視敘事形式如何參與政治與認知意義的建構，仍具有重要研究價值。本文將進一步探討敘事形式如何塑造讀者對權力、理性與社會秩序的認知方式，關注《格列佛遊記》如何通過獨特的敘事結構、時間與空間的非線性建構，以及格列佛作為不可靠敘述者的敘事策略。通過這一視角，本文試圖說明斯威夫特如何突破傳統冒險敘事框架，使小說在荒誕敘述中隱喻性地呈現對英國社會在道德、政治、科技與社會結構等層面的反思與批判。

二、故事的碎片化：從敘事結構看《格列佛遊記》

《格列佛遊記》在整體結構上延續了典型的『流浪漢小說』敘事模式，但斯威夫特並未將這一模式僅作為情節推進的形式框架，而是將其轉化為一種製造經驗斷裂與認知重組的敘事機製。小說以格列佛的海外航行為敘事框架，通過『離家—遠遊—返鄉』的循環結構，使敘事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與碎片化特征。每一次

返鄉不僅標誌著航行的結束,同時也構成敘事意義的斷裂點,使格列佛無法在連續的現實經驗中形成穩定的價值認知。四次航行在敘事層面雖相對獨立,但通過諷刺機製形成內在關聯,從而構成一個具有整體指向性的文本結構。這種循環結構在四次航行之間形成遞進式諷刺強化:小人國與大人國通過身體比例的極端逆轉,使社會權力結構在不同尺度中反復顯形,揭示個體主體性在權力秩序中的可變與脆弱;飛島國通過將科學研究與哲學思辨推向脫離經驗世界的極端狀態,呈現知識話語在抽象化過程中的自我封閉;而慧駟國則通過建構高度理性化的社會模型,將秩序原則推至排他與暴力的邊緣,從而使諷刺由政治製度批判延伸至理性本身的悖論。

循環航行結構構成敘事的宏觀框架,那麼敘事時間的分配則進一步塑造了文本內部的意義層級。熱奈特在《敘事話語》中指出:敘述是一種雙重時間序列:其中有一種是所講述事物的時間,另一種是敘述的時間,敘事的功能之一是把一種時間兌現為另一種時間^①。在強調並區別時間的雙重性,即故事時間和敘事時間的同時,他主張從順序、時距與頻率這三個基本限定來研究兩者的關係。斯威夫特在現實空間與虛構空間之間採取明顯不對稱的時間配置策略:敘述者關於英國社會與家庭生活的描寫通常以高度壓縮的概要形式呈現,而對異域社會的描寫則通過細節鋪陳與場景延展獲得敘事上的顯著擴張。例如,在第一卷中,格列佛簡要提及個人成長經歷與家庭關係,往往僅以數段文字帶過。在從小人國歸國後,格列佛感嘆『我和妻子兒女一起只住了兩個月,由於我想去異國他鄉觀光,這種欲望使我住不下去了』^②。這一筆便省略掉了格列佛在家中幾個月的生活,並迅速過渡至下一段大人國的航行經歷,呈現出了一種『省略越多,敘事速度越慢』的結構策略。敘事時距的延展與省略機製的強化相互配合,使文本呈現出更為顯著的間斷結構^③。這種處理方式並非單純的篇幅安排,而是斯威夫特通過時間配置將現實英國置於敘事邊緣,使其成為需要通過虛構社會加以重新理解的對象。正如吉爾·德勒茲所說:『純粹的虛擬不再需要實現自己,因為它是現實的嚴格關聯者,它與現實形成了最緊密的聯系』。^④

斯威夫特不僅通過時間配置重構敘事節奏,同時還借助空間結構的組織方式進一步強化文本的碎片化特征。隨著人物行動的展開,各類空間場所呈現出曲折離奇的情節發展,成為後世航海小說與遊歷小說的經典敘事樣板^⑤。小說通過將虛構空間嵌入具體航海路線與地理坐標體系之中,使幻想世界獲得類似歷史紀實的真实感。從敘事結構層面來看,這種空間安排形成了一種由現實地理向虛構空間不斷延展的層級結構,使不同航行章節在空間上呈現出既相互獨立又彼此連通的拼接關係。小說中,英格蘭和愛爾蘭作為一種象征和隱喻存在,創造出一種地方感,賦予小說重要的地形意義^⑥。這種敘事真實性不僅增強文本的沈浸效果,也強化了虛構社會對現實製度的隱喻力量。通過不斷擴展異域空間的敘事容量並壓縮現實社會的敘述厚度,小說在文本內部建構出一種意義轉移機製,使碎片化結構最終轉化為對18世紀英國政治秩序與知識體系的系統性批判。

三、不可靠敘述者與權力的流動:格列佛的主觀視角與社會批判

《格列佛遊記》中的敘事方式主要採用了內聚焦視角。作為故事的敘述者和焦點人物,格列佛的視角貫穿整個小說,講述了他在小人國、大人國、飛島國和慧駟國的經歷與感受。第一人稱主人公敘述中的體驗視角能夠將讀者直接引入『我』正在經歷事件的內心世界,可以直接生動地激發讀者的同情心或製造懸念,因此讀者也可以更自然地直接接觸人物細緻、複雜的內心活動^⑦。作為自身經歷的敘述者,格列佛既是聚焦對象又是聚焦者,這意味著,他的回顧性眼光是整個敘事的常規視角^⑧。通過這種敘事策略,讀者能夠跟隨格列佛的目光,進入這些奇異的虛構世界,同時也體驗到他在旅程中不斷變化的心態和對社會現實的反思。然而,由於讀者只能通過格列佛的觀察與判斷理解異域社會,敘事權威事實上依賴於一個不斷變化且充滿



偏差的認知主體。由此，小說在強化體驗真實感的同時，也持續削弱敘述話語的確定性，使讀者在依賴敘述的同時被迫保持解釋距離。

除了內聚焦視角，小說中還存在敘事焦點的轉變，這種轉變不僅增強了敘事的層次感，還巧妙地構建了現實國家與虛構世界之間的對比與相互映襯。正如熱奈特指出的，『不折不扣的所謂內聚焦是十分罕見的，因為這種敘述方式的原則極其嚴格地要求絕不從外部描寫甚至提到焦點人物，敘述者也不得客觀地分析他的思想或感受。』⁹在小人國，格列佛的身體『至少可抵得上一千七百二十八個小人國的人』¹⁰。然而當他到達大人國後，格列佛『在這個民族中間就顯得微不足道了』¹¹。格列佛甚至最終在慧駟國適應了馬類的生活，返還英國後無法接受自己的人類形象，以至於『經常對照鏡子看看自己的形象』¹²。身體比例的反復置換不僅構成空間奇觀，更使敘述主體在權力中心與邊緣之間不斷流動，揭示敘事權威並非穩定存在，而是由社會結構持續塑造。斯威夫特通過這種聚焦位置的流變，將個體經驗轉化為對權力話語與文化等級秩序的持續解構。

在此敘事框架下，格列佛逐漸顯現出典型的不可靠敘述特征。韋恩·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率先提出了不可靠敘述者的概念，即『我把按照作品規範（即隱含作者的規範）說話和行動的敘述者稱作可靠敘述者，反之稱為不可靠敘述者。』¹³格列佛作為敘述者的觀點常常受到他個人偏見、有限視角以及情感波動的影響。例如，他在不同虛構國度的經歷，雖然為讀者提供了細致的觀察，但卻不可避免地受到他對『他者』的主觀看法和局限性所扭曲。格列佛的自負與對外部世界的強烈反應，使得他在多個場合展現出對周遭事物的極端判斷。尤其是他在慧駟國部分對人類社會的厭棄，面對人類形象雅虎，其感嘆道『從來沒有一種動物讓我本能地感到這般厭惡』。¹⁴他對這些社會的理解與評價不僅是個人化的，也是有限的，這種局限性使得讀者得以反思小說中揭示的權力結構與社會製度的矛盾與荒誕。正如布斯所言，當讀者發現敘述者的事件或價值判斷不可靠時，反諷的效果往往就能產生。¹⁵

並且斯威夫特選擇讓故事主人公格列佛用第一人稱進行敘事的策略，使其傳達斯威夫特本人的態度與觀點。熱奈特指出，在虛構文學中，將敘述者與作者直接等同，這種混淆並不成立，因為虛構作品中的敘述者通常是由作者建構的敘事角色，而非作者身份的直接再現，區分二者有助於揭示敘述者在虛構世界中的功能與位置，並使讀者能夠從敘述策略與視角選擇中理解文本所傳達的深層意義與價值指向¹⁶。整部小說實際上是通過格列佛這一虛構敘述者的口吻呈現的，格列佛的個人身份或者個人主體性問題本質上是斯威夫特對現實社會的矛盾觀點的反映，他巧妙地讓格列佛借助彰顯個人主體性的語言、心理參與奇異國度的社會想象¹⁷。而格列佛視角下的價值抉擇或是態度，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斯威夫特自身的觀點。例如對飛鳥國科學院中荒謬實驗的描寫，這實際上是斯威夫特對18世紀以培根為代表的『新科學』思想，尤其是對啟蒙時代科學烏托邦主義的深刻反思¹⁸。當格列佛寧願留在慧駟國，或者選擇繼續漂泊於其他島嶼，而不是回歸現實中的英國時，斯威夫特通過這一情節表達了對現實社會的無力感，體現了他對人類社會現狀的深刻失望。慧駟國寄托著他對理想世界的渴望，能夠使其暫時擺脫對現實世界的壓迫和困境。

四、結論

小說通過將虛構國家，如小人國、大人國、飛鳥國等，與現實中的英國並置，成功為讀者建構出兼具陌生化與現實指涉的敘事效果。斯威夫特通過不同敘事時距的安排，虛構國家在小說中獲得了充分展開的空間，而現實國家多以間接方式呈現，二者通過時距差異形成張力關係，從而強化了文本的批判深度。同時，這種敘事策略並非簡單以虛構替代現實，而是通過虛構空間中的價值判斷不斷動搖現實社會既定評價體系。隨著敘事視角的變化，虛構國家不僅成為現實國家的反照，也在對比中呈現多重價值維度。第一人稱

敘述方式揭示了格列佛認知與價值判斷的持續偏移,不可靠敘述在強化諷刺效果的同時,也使讀者能夠重新審視啟蒙時代關於理性與社會秩序的敘事邏輯。總體而言,《格列佛遊記》通過時間結構、敘述視角與空間建構的協同運作,表明斯威夫特的諷刺並非僅依賴主題內容,而是深植於敘事機製本身。正如美國文學批評家肖恩·摩爾所言,『諷刺成為反殖民民族文學經典興起的前提條件,使文學文本能夠從帝國霸權性的文化與行政體製中開辟出屬於自身的文本空間與政治空間。』¹⁹這一研究從敘事學角度揭示了18世紀文學如何通過形式策略介入政治與認知結構,也為重新理解啟蒙時期文學與權力話語之間的關係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徑。

注釋

- ①③⑨⑬ Genette, G. (1980).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J. E. Lewin, Trans.).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33, 92–93, 192, 213.
- ②⑩⑪⑫⑭ Swift, J. (2005). *Gulliver's travels* (C. Rawson & I. Higgins,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1, 34, 78, 276, 209.
- ④ Westphal, B. (2011). *Geocriticism: Real and fictional spaces* (R. Tally, Tran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86.
- ⑤⑦ 申丹,王麗亞:《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後經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頁139+104。
- ⑥ 林絳雪:《〈格列佛遊記〉中的地理空間敘事》,2024年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頁64。
- ⑧ 龔璇:《〈格列佛遊記〉中的視覺隱喻與愛爾蘭問題》,《國外文學》,2018年,第2期,頁57。
- ⑬⑮ Booth, W. C. (1961).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58–159, 300–309.
- ⑰ 胡振明:《〈格列佛遊記〉——18世紀英國諷刺與社會想象》,《復旦外國語言文學論叢》,2020年第1期,頁108。
- ⑱ Houston, C. (2007). Utopia, dystopia or anti-utopia? Gulliver's travels and the Utopian mode of discourse. *Utopian Studies*, 18 (3), 425–442.
- ⑲ Moore, S. D. (2010). *Swift, the book, and the Irish financial revolution: Satire and sovereignty in colonial Ireland*.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

(Editors: Derrick MI & Joe ZHANG)